

中国古代大同社会思想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

韩宇翔*

〈目 录〉

- I. 绪言
- II. 中国古代大同社会思想的产生与演变
- III. 小说中所体现的大同社会思想
 - 1. 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
 - 2. 追求“至德”、“至善”的社会
 - 3. 奇异幻想的仙境福地
- IV. 结语

1. 绪言

每个民族文化中都存在着一种美好的思想，它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在那里人人平等、安居乐业，仿佛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如果说在西方它被称为“乌托邦(Utopia)”思想的话，那么在中国与之对应的则应该是“大同社会”思想了。但由于东西方存在较大的历史与文化差异，中国人民对于这种“东方式乌托邦”思想，即“大同社会”思想的运用更多是从中寻找解决现实矛盾的方法，同时企图利用这一套理论作为行动指导，推翻现实的社会，使底层的人民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共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理想的社会制度；亦或者将苦难的现实看做是一种修行并试图从中寻找一种精神上的解脱。而相较于西方乌托邦思想中的原文“Utopia”一词，其中的“u”既可以理解为“ou”，即没有、不存在，同时也可看作“eu”，即美好完美，因此“Utopia”的准确含义应为“一个美好却又不存在的地方”，而“ou”作为

* 韩国岭南大学 中语中文学专攻 博士生

乌托邦思想的核心之一，同时也寓意了其本身的虚无缥缈和无法实现性。因此光从这一点来看，西方的乌托邦和中国的大同社会虽然都是在幻想一个美好的“理想国”，但却还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在中国古代“大同”的涵义有四种：1、谓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庄子·在宥』：“颂论形驱，合符大同，大同而无己。”2、战国末至汉初的儒家学派提出的一种理想社会，与“小康”相对。『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3、指国家统一。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旧意？”王利器集解：“此当隋时而言，隋统一天下，结束南北对峙局面，故云‘大同’。”4、大体相同。『汉书·西域传上·大宛国』：“自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自相晓知也。”¹⁾本文中提到的大同社会思想即前面所述第二个涵义，在『礼记·礼运』中不仅构建了一种大同社会，而且还提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核心思想与具体方法，即“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虽然年代久远我们无法确定『礼记』中的文章是否为孔子的原话，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传统儒学中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社会，而千百年来，中国人也早已将“大同社会”作为理想国家、美好世界等思想的代称。不管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还是杜甫的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开颜”，这种思想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大多有所体现。而随着宋元以后叙事文学的长足发展，“大同社会”思想也从一句简单的奋力疾呼变成了描绘文人心目中“理想国”的指导理论。例如小说四大名著中，除了历史演义的『三国演义』以外，不论是『西游记』中大大小小的神仙洞府，还是『水浒传』中靠着江湖道义维系的“水泊梁山”，再到『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太虚幻境”，小说家们在其作品中通过虚构与想象创造了一个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理想世界。“一个丧失了

1) 吴佩林,「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辨略」,『太原教育学院学报』第21卷 第三期, 2003: 32.

乌托邦渴望的世界是绝望的。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而言，没有乌托邦理想就像旅行中没有指南针。”²⁾同理我们也离不开对于大同社会的想象与追求，而作者在小说中描绘的“理想国”则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去为了实现“大同”这一理想而努力奋斗。同时在其思想研究方面，陈正炎、林其铨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中将古代的大同思想(这里所讲的大同思想即大同社会思想)的表现形式主要归为六类：“依托远古勾画出的大同社会的美妙蓝图、人间的社会追求采取了非人间的境界、用形象的语言塑造出大同社会的意境、政治家和改革家对社会方案的制定、类似西方空想主义者所进行的社会实验、农民起义提出的行动纲领和斗争口号。”³⁾而对于文学作品中大同社会思想的体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和研究的现状相比并不相称，因此笔者试图以几部主要的小说作品为例考察中国古代大同社会思想是如何指引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极其文化上的继承关系。而这种充满着无限魅力的思想，就好比洞穴中的一缕阳光，只要存在，人类追求和探索的脚步就必然不会停止。

II. 中国古代大同社会思想的产生与演变

大同社会思想在先秦时期便早已存在于人民的想象之中了，只不过还都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阶级分化开始进一步加剧，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更有甚者被剥离了土地沦为奴隶。因此底层百姓开始反抗，期望离开这个现实社会去寻找心中的“乐土”，《诗》有云：“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⁴⁾诗中直呼剥削者为硕鼠，

2) (美)拉塞尔·雅各比著，姚建斌译，《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91。

3) 陈正炎、林其铨，《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0。

期望离开这里去寻找“乐土”、“乐国”和“乐郊”，实际上这三个单词对应的是一个地方，即现实中不存在的理想国度，反映了底层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初步具备了“大同社会”思想的雏形，但由于其发源于劳动人民的直接呐喊所以并不具备所谓的思想体系。

至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为了救黎民于水火之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时候的主张大多经过多方论证，至于思想体系则相对完善，郑东华在其『先秦大同思想述评』中将当时大同社会思想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以下六点：1、反对剥削和压迫。2、财产共有。3、人人劳动。4、平均分配消费品。5、合理分工，选贤与能。6、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社会风气。⁵⁾可以看出，虽然各家思想往往侧重点不同，但是将这些观点综合在一起看，已经比较完善，基本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具体来看，又以儒家、道家、农家三家为代表。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则主要体现在前文所述的『礼记』中，这里不做过多的赘述。而道家又以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两种思想为代表。具体来看『道德经』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⁶⁾表面上来看，有什伯之器但不用，有舟舆但不乘，并使民复结绳而用，像是一种对于历史倒退的幻想，抛开现实社会，去追求朴素而封闭的原始社会。但仔细分析老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处于礼崩乐坏之边缘，诸侯国各自为政，土地兼并频繁，而这种复古思想，更多的是对于当时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同时也是一种对于上古尧舜禹时代的怀念。同时老子的这种“怀古”又同『礼记』中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这种对于旧时期的怀念而产生的“大同社会”理想，同柏拉图对于“消逝的大陆”的怀念从而激发“理想国”的想象又是何其的相似。它们都存在于遥远的过去，只不过老子、孔子所伤感的是

4) 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中华书局，2002：144-145。

5) 郑东华，『先秦大同思想述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1995：49-51。

6) 辛战军，『老子译注』，『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中华书局，2008：302。

7) 杨天宇，『礼记译注』，『十三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65。

对于自身文明陷落的缅怀，而柏拉图则是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一个早已消失的古文明之上。而道家与儒家的不同又在于儒家看似“怀古”，实为“托古”是着眼于未来的，至于孔子所提出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于今后之“理想国”塑造所需的施政方领。而庄子的心中的“理想国”则比老子的更为纯粹，讲究的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⁸⁾的清淡寡欲、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强调的是人内心的一种修养。除此以外，『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饗飧而治。”则主要反映了农家对于理想社会的幻想，其核心思想是人人劳动，平均分配。但依旧无法摆脱小农经济下的思想局限性。三家之外，法家、墨家等其他各派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特别是法家和墨家，主要属于技术型的思想模式。但是这些思想要么托古改制，把希望寄托于统治阶级的自我反省和施行“仁政”；要么超越现实，以平均求平等，犯有绝对主义的错误。因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同思想既是批判现实的，又是严重脱离实际的；既启发了下层人民的斗争觉悟，同时却又紧紧地束缚了他们的手脚。⁹⁾

秦汉以后国家进入一个大一统时代，同时在思想上“罢拙百家，独尊儒术”，各路思想也逐步合流，这使得在吸收了各家的观点之下的儒家对于大同社会思想的描述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对于理想社会的一种定型。虽然后期各朝代统治阶级大部分时间多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但后世儒家的大同社会思想却一直没有比较大的突破。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道教开始兴起，至于魏晋佛教也开始进入中原并随后本土化，因此一种强调“出世”的“大同社会思想”也随之开始流行起来，它们将人世间经历的苦难看成是一种为了得道的修行，通过现世的努力以求到了死后，或者轮回后，可以生活在一个没有苦难却又充满欢乐的理想世界之中。与“入世”的大同社会需要共同创造而产生不同，这种强调“出世”的理想世界就在那里，而在现实世界中则需要为了拿到它的入场券而去努力奋斗。这种类型的大同社会追求，是与当时强调入世的统治阶级立理想相悖的，因此这类思想多体现于笔记、小说等当时的“非主流”文学作品中。

8) 杨柳桥，『庄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5.

9) 同注5，51.

Ⅲ. 小说中所体现的大同社会思想

小说的出现，极大程度地丰富了大同社会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在小说作品虚构的“理想国”中，人民幸福、安居乐业，这些都同作者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借此来抒发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而从魏晋至唐宋再及明清，小说的形式、题材大大发展，同时也经历了由文言到白话，从短篇到长篇的转变，这些变化使得文学作品中的“理想国”被描绘的越来越具体，虽然古代小说中含有大同思想的篇目并没有很多，但是它所给一般百姓带来的影响却不容小视，而这些虚构的“理想国”又各不相同、特点鲜明。具体来看，小说中所展现的以大同社会思想为指导而建立的“理想国”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第二类是追求“至德”、“至善”的社会，第三类是奇异幻想的仙境福地，下面就这三种类型为代表分别举例说明。

1. 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

要说文学作品中小国寡民“理想国”的代表当属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了。众所周知自『桃花源记』诞生以来则长期被归入游记类或记传类散文。而在魏晋南北朝那样一个神话传说、佛经故事遍天下的时代，自然而然会产生一些神异之说，在将这些故事加以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之上，便诞生了志怪小说这一新的文学体裁，至于这种新兴的文学形式也时刻影响着陶渊明的创作思维。特别是志怪小说中在记录者对于民间异闻的搜集整理过程中，免不了会根据自己的想象虚构一些情节与叙事，这便是志怪小说中常见的“幻设”，而在『桃花源记』中也存在这样的“幻设”，其一，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而率妻子来此绝境，至于魏晋六百年间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很难让人相信在这期间他们是如何解决衣食住行等诸多生存问题的，而在现实中这样的小群体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而独立存在。其二，渔人告诉太守之后，太守遣人根据渔人留下的线索前往而最终不复得路的情况也不符合常理。因此虽然文中描绘的自给自足的小型农耕

社会虽然在古代也存在原型，但是由于“幻设”的存在，也很难说其为“纪实”。同时在疑似伪托为陶渊明所撰的『搜神后记』中有“会稽剡县民袁相、根硕二人猎，……草木皆香”¹⁰⁾这样一段描写，可以看出其与『桃花源记』不论在行文方式、空间描写、语言特色等方面都与其十分类似。且在『搜神后记』的下文中甚至还出现同『桃花源记』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不复得焉”¹¹⁾完全一模一样的章节。不仅如此，在杨秋荣的「桃花源记-魏晋时期最伟大的玄怪小说」¹²⁾、卢英宏的「『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¹³⁾和萧东海的「论『桃花源记』体裁是小说」¹⁴⁾中都针对『桃花源记』的文体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此就不多赘述了。综上所述本文中会将『桃花源记』看做为小说一并讨论。而在其文中描绘了这样一幅社会风景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¹⁵⁾

这种环境同当时的颠沛流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通过记载也可得知陶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¹⁶⁾他在『饮酒』其十六也说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¹⁷⁾说明其在年少之时也曾得力于儒学，并也有着“大济苍生”、“兼济天下”之理想，奈何仕途多舛，慢慢的对现实失去了期望，同时在老庄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也不免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¹⁸⁾从中又体现着他对于自然的无限向往。因此从陶渊明的身上可以同时看出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修养。即便他本人退隐山林过起了一种悠闲的田园生活，但也时刻忧国忧民，而『桃花源记』中的“理

10) 汪绍楹 校注，陶潜 撰，『搜神后记』卷一，中华书局，1981：2.

11) 同上，4.

12) 杨秋荣，「桃花源记-魏晋时期最伟大的玄怪小说」，『北京教育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11.

13) 卢英宏，「『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岳阳大学学报』第10卷第2期，1997.

14) 萧东海，「论『桃花源记』体裁是小说」，『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16卷第1期，1995.

15)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329.

16) 同上，848.

17) 同上，185.

18) 同上，53.

想国”便是这种复杂思想下的产物。在这个社会中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并不存在现实中的君臣关系，人人耕而食之。而对于这样的“桃花源”是否真的存在这一问题，作者本人的态度却十分模糊，从前文的“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的描述，在到后面的渔人随按图索骥却最终不复得路可以看出“桃花源”本身是虚无缥缈的，而后却提到了历史上的真人刘子骥，则是将“虚”与“实”巧妙的糅合在了一起。虽然最终我们知道，这个“理想国”并不存在于现实，但却在后世文人墨客的心中埋下了一颗不可磨灭的种子。

与之相似的还有宋人笔记『昨梦录』一文，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知为宋朝人康与之撰。文中提到的“吾此间凡衣服、饮食、牛畜、丝纩、麻枲之属，皆不私藏，与众共之”¹⁹⁾，可见在那个社会环境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共有的，平均分配、平均土地，共同劳动，以此来换得人人和平相处。由此可以看出在陶渊明和康与之看来，如果这个世上真存在世外桃源，那么前提条件是它所占的物理空间一定不能很大，而后的不复得路和“子来或迟，则封穴矣”则表明，若想找到此地需要一定的机缘巧合。

这种理想社会勾勒了一种类似于老子所讲的“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存环境，而这种类型的社会，可以看成是道家大同社会思想的一种外延，其中也包含了农家“并耕而食”从而消除剥削的朴素的大同社会思想。由于这种生存环境的闭塞性，也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可以不会轻易的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从而并保持民性质朴的根本原因，且由于其本身面积不大，也可以做到消除阶级，人人平均，共同劳动。在追求这种大同社会思想的人看来，构建理想的社会环境，并不需要遵循儒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单靠人类朴素的本性便可自然达到。而老子一直以来也提倡“常使民无知无欲”²⁰⁾，且“为无为，则无不治”²¹⁾要求人民保持心智淳朴，统治者无为而治，面对遇到的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便是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这种原始且质朴的“天人合一”的

19) 康与之，『昨梦录』，原引自：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大同思想资料』，中华书局，1959：35。

20) 沙少海，徐子宏，『老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5。

21) 同上，5。

理念，便是小说中“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理想国的基本组成部分。从老子至《桃花源记》再到继承了其构思模式的《昨梦录》这种小国寡民式的“理想国”也完成了由文人至民间的转变，而“桃花源”、“桃花”也一度成为这种大同世界的代称。在这之后还出现了一系列的衍生作品，既有诗歌也有散文，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桃花源”的意象不断丰富，而文人对于其中所描绘的美好世界多是赞美或讴歌，使其成为一个内涵丰富且美好的代名词。而这种小国寡民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同西方乌托邦思想的起源之作《乌托邦》中莫尔所描绘的“孤岛式”乌托邦中的环境又极为相似，只不过莫尔主要是借乌托邦来讽刺当时的英国黑暗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寄希望于这种乌托邦的实现。相较来说，中国文人笔下的“桃源”少了些许讽刺与幻想，却又多了几分理想。

2. 追求“至德”、“至善”的社会

这种社会的代表主要有《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和《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两种形式。其模式的主要特点是：生活在之中的人们人人平等、好让不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在其内部主要靠的是个人的道德品行、整体的道德社会风气又或是一种江湖义气来维系的。

具体来看，《水浒传》最早起源于宋朝的《大宋宣和遗事》，是流传于民间的大大小小的关于宋朝农民起义故事，经过数代人的智慧集体创作产物。到了施耐庵手里，他并没有将其单纯的描绘成一个农民起义从发展到失败过程的故事，而是通过对于“梁山泊”这一场景的塑造，表达了一种仁人志士在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时做出的一种选择，建立一个“大同社会”，同时寄托了作者本人对于“理想国”的一种期望。大同社会思想的载体便是小说中的“梁山泊”，文章中对于梁山泊描写的部分共有三十多回，而作者在刻画这个独立于外部社会的“理想国”时，并不是一上来就系统的介绍全景全貌，而是采取了层次递进的方法，通过远景、近景等变化将六关八寨逐步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梁山泊的周围还附有联络站和据点，俨然一个城池坚硬的国中国。其中生活在里面的好汉们在宋江的带领下立下誓言：

“自今以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察鉴，报应昭彰。”²²⁾

“替天行道”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忠”、“义”二字乃维系这个社会的思想的内涵。同时它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社会，而是活生生的存在，并且企图改变现实黑暗社会的一种积极地实践方式。如王钟麒在『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中所讲：“生民以来，未有以百八十人组织政府，而人人平等者。有之，惟『水浒传』。”²³⁾而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下，其内部也还是存在一定的等级，但是等级划分的标准则是一个人的道德品行，如宋江，乃深明大义之贤人，同时他也居于这个社会的上层地位，又仿佛儒家所追寻的“内圣外王”的社会制度，具有双重性。此外在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评论：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义并无差。其人则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王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²⁴⁾

它除了大体交代了好汉们在进入梁山以前的社会背景以外，更是体现了大同社会思想的精髓所在。而这种理想国的设置，可以说是最符合传统社会下的一般百姓心中对于“大同社会”幻想，以至于后期的许多农民起义都以“水浒”为蓝本，而梁山好汉的口号也成为了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强调替天行道、人人平等，同时反对剥削与压迫。而以当今世人的眼光来看，其中强调的诸如自由平等思想与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格格不入，而个人的品行和道义更是一种十分脆弱的纽带，因

22) 施耐庵，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050。

23) 『月月小说』第1卷 第9期(1907年)，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24) 施耐庵著，金圣叹评，刘一舟校点，『金圣叹批评 水浒传』，齐鲁书社，1991：1303-1304。

此无论是小说中最后的结尾还是现实中以此为纲的农民起义最终都免不了走向失败的命运。

此外『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也是这样一种基于道德和品行来约束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书中第一回到第五十回是小说的第一部分，主要讲了唐敖同其妻弟林之洋结伴同行周游列国，在此期间见识到了许多奇风异俗、奇人异事，这也是全书的精华所在。而君子国便是他们在这场海外游历中遇到的一个国家。至于“君子国”本并不是李汝珍之原创，早在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地理风俗志『山海经』中，便有了对它的描述：

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有薰华草，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²⁵⁾

可以看出，君子国的人有两个特点，其一是衣冠带剑，其二便是好让不争。『山海经』中对于君子国描述不多，而李汝珍在『镜花缘』里则是沿袭了这一称呼，并将其放在了海外游历众国的第一位，用了许多笔墨将其描绘成了一个“好让不争”的理想国度。唐、多二人一路走来发现此地人民“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已有不争之意，并且通过几宗市场上的交易光景发现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论高低贵贱，言谈举止皆彬彬有礼，不愧“君子”二字。并且国家的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国门大书‘惟善为宝’，就是此意。”²⁶⁾，吴之和、吴之祥虽贵为宰辅却谦恭和蔼。反之也可推断出，作者所生活的现实社会必然是一幅尔虞我诈、徇私舞弊的光景，人们在市场上唯利是图、缺斤少两，而谈论起海外诸国必然以天朝自居，高高在上，同时在官场上必然是政以贿成、居高临下。对此鲁迅评价称“其于社会制度，亦有不平，每设事端，以寓理想；惜为时势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国民情，甚受作者叹羨，然因让而争，矫伪已甚，生息此土，则亦劳矣，不如作谈谐观，反有启颜之效也。”²⁷⁾鲁迅虽将其认

25) 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巴蜀书社，1993：301.

26) 李汝珍，『镜花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86.

2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书馆，2011：233.

成一篇启颜之文，但细细品来，通过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对话不难看出，在这个君子国中，虽然存在基于现实社会深深的讽刺，却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大同社会的构想。他希望可以存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面人的言行举止莫不君子，待人处世莫不仁义，由于整体人们的道德素养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不需要严格的律法约束，也可做到公平公正。

关于这种类型的理想国事实上是儒家讲究伦理道德“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和庄子所提出又由儒家所发扬光大的“至德之世”这两种大同社会思想结合的一种产物。而不论是『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还是『镜花缘』中的“君子国”，作者虽然没有过多的物理空间部分的描写，但是通过生活在其中人们的言行举止和为人处世，侧面的展现了他们所处的环境背景，而构成这一理想环境的核心条件便是人人心中的一杆道德仁义的天平。这种大同社会的建立，更像是一种儒家士子为了将经书中所追求的理想世界实践化的一种表现，借由小说中丰富的表现形式，这种理想经历了由抽象至具体的转变。“水泊梁山”和“君子国”，它们作为大同社会思想实施的载体，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人人平等，却在内部还遵循着属于自己的一套等级规律，并没有跳出封建社会下等级观念的固化思维。即便如此，对比小说中其他两种类型的大同社会，“水泊梁山”和“君子国”的出现，使得大同社会思想在当时看来，逐步从一种理想，慢慢变成了一个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特别是在“水泊梁山”中这体现的尤为明显。而在它其中所表达的人民对于不平等的反抗精神自『诗经』中便已经存在，且一直延续至今，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无数的起义、革命也时刻践行着“哪里有不公哪里就有反抗”这一口号，而“梁山”提供给人们的，更多的是在起义之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其最初的行为准则，而“替天行道”的核心也在于惩奸除恶，时刻维护着社会的公平、公正。“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必然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²⁸⁾特别是在西方乌托邦思想产生的中后期，也产生了这种偏实践性的小说作品，例如哈林顿在『大洋国』中便向读者展示了这种倾向，它虽然在形式上虽然可以被看

28)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2.

成上是一部乌托邦小说，但实际上却为当时处于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英国提供了一套施政纲领和解决方案。只不过和它相比，古代的中国文人则更加倾向于在现有的封建制度下如何构建一个相对完美的理想世界。

3. 奇异幻想的仙境福地

如果说前面两种理想国描绘的重点在于社会制度方面的话，那么下面这种理想国叙述的重点则在于空间的刻画和对于个人生命的最终追求方面。其中又以『西游记』中的仙境福地类为代表。

具体来看，『西游记』是浪漫主义的神魔类小说之代表作，其底本为唐代的『大唐西域记』与宋朝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者在此基础上融合了大大小小的民间神话传说再加以本人丰富的想象力从而创造出来的一部名著。它同时也是一部将儒释道的精华融为一体的小说。其中的理想国以各种神仙仙境为代表，是古代大同社会思想和远古宗教信仰结合之产物。佛经说：

佛告长老舍利弗：“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²⁹⁾

在它所描绘的极乐世界中，有七宝池，池中充满八功德水，而池底皆是金沙，四面阶道也都是由金银、琉璃组合而成。生活在那里的众生没有苦难，并且能够享受众多快乐。可以说自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以来，其中的各路思想便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时刻影响着文人对于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构思。而『西游记』中的极乐世界，也正是这样一个多种思想结合的产物，它代表着美好的地方，既是师徒四人旅程的目标，也是神仙世界的一个缩影。自从师徒四人进入天竺国便发现“所过地方，家家向善，户户斋僧”³⁰⁾已是一片祥和之意，在看那

29) 宣化法师，『佛说阿弥陀经浅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157.

30) 黄永年、黄寿成点校，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中华书局，1993：825.

灵山祥光五色，瑞千重藹，乃佛祖之圣境，而至于雷音古刹，作者描写的就更为具体了：

顶摩霄汉，根接须弥。巧峰排列，怪石参差。悬崖下瑶草琪花，曲径旁紫芝香蕙。浮屠塔显，优钵花香。黄森森金瓦迭鸳鸯，明幌幌花砖嵌玛瑙。数不尽蕊宫珠阙，看不了宝阁珍楼。天王殿上放霞光，护法堂前歎紫焰。正是地胜疑天别，云闲觉昼长。红尘不到诸缘尽，万劫无亏大法堂。

不仅如此，作者书中对于这类神仙景象的描写数不胜数，不管是终点的雷音寺，还是之前的充满道教色彩的方丈仙山、瀛洲海岛等地，他们都有着共同点，比如都有霞光、瑞气，里面虽无人间烟火，但世间的奇珍异宝却样样不少，四时草木、瓜果，奇珍异兽更是数之不尽。可以说在其中汇集了当时人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条件。而对比书中佛祖口中的大唐所处所在的南瞻部洲却“多贪多杀，多淫多诞，多欺多诈，不遵佛教，不向善缘，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瞋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生。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³¹⁾其讽刺意味可谓是极其明显了。

而这种类型的理想世界创造，主要是基于强调“出世”的大同社会思想，同时结合当时流行的宗教思想和古代的神话传说。对于其构成完全建立在作者的想象之上，而要想离开黑暗的现实社会去到那里生活，则需要历经千辛万苦，完成常人近乎不可能做到的修行才有可能在现世甚至于后世得道成仙位列其中，以享万世之乐。其核心精神还是在于皈依的最高境界。它和之前的两种大同社会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前两种大同世界只是设想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不在乎生活在里面的人是否真正幸福，是否愿意留在那里生活的话，那么这种强调“出世”的大同社会则真正将关注的重点真正放在了个人身上。在人们想象理想国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误区，认为只要拥有了完美的制度，丰富的物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便会幸福，因此经常将理想国构造的重点放在了制度和组织方面，人人平等、并耕而食，往往也意味着个人服从于集体，个人的需求和自由并不能得到

31) 同上，829.

充分的体现。而以『西游记』为代表的这类“仙境福地”式的大同社会，除了描绘了一幅神仙式的生存环境以外还特别强调了生活在其中个人的生命是可以长生不老，永享万福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了一个永远充满活力长生不老的新鲜肉体 and 这副身体的美好归宿，从而有悖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同”对于理想的社会制度方面的追求，而将关注的中心放在了个人的内心世界，企图用内心的满足来填补黑暗的现实社会给人所带来的空虚。小说中这些基于古代神话传说而重现的各种仙境，体现了自古以来受宗教影响下的一般民众对于生命最终归宿的无尽思考。与之对应的则是西方犹太-基督世界中所描绘的一种理想世界，例如天堂（Paradise）、伊甸园（Garden of Eden）等地，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因素无论对东方的大同世界还是西方的乌托邦思想都分别给予了极大地影响。

VI. 结语

以上是从几部中国古代小说中简略的梳理了一下各类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理想世界理念，虽然它们的出发点都是在面对残酷现实的黑暗社会环境下企图构建或寻找心目中的理想的“大同社会”。但在侧重点各不相同的大同社会思想的指导下，小说中也有着小国寡民的世外桃源、追求“至德”、“至善”的社会、奇异幻想的仙境福地三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三者又可看做是亦真亦幻、相对现实、天马行空三种不同的文学创作手法。从“大同社会思想”起源与发展在至于文学最后到小说，它遵循着一条从对大同社会的幻想，到经历具体的实施方案，最后到实践的隐形线索，其中还包含了文人式的浪漫主义思想。而这条线索也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大同社会”作为一种具有无穷魅力的文学思想，从萌芽至今也已经过了两千余年了，它包含了不同时代文人的时代感悟与理想价值，同时也是西方乌托邦思想传入中国以前，中国文人心中建立“理想国”的理论指导。相较于其他文学形式，小说中的理想世界则更加富于幻想。不论是“桃花源”、“君子国”还是“水泊梁

山”、“极乐世界”它们终究是处于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但即便如此，究其本质这些依然是古代文人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而进行宣泄的产物，在看似虚无缥缈的空间内也蕴含了作者对于构建心目中理想世界的憧憬与希望。在各种思想泛滥的21世纪，它好像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也依然必不可少。虽然其中的很多设想在世人看来最终很难实现，但依然不妨碍其成为人类社会向前的动力。“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不值一瞥，因为它忽略了人类不断去造访那个国家。而人类一旦抵达那里，放眼望去，看见一个更为美好的国家，便又扬帆驶去。进步就是乌托邦的不断实现。”³²⁾同理，进步也正是“大同社会”理想的不断实现。

〈参考文献〉

1. 『月月小说』第1卷 第9期(1907年)，据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转录。
 2. 陈正炎、林其铨，『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 黄永年、黄寿成点校，黄周星定本西游证道书『西游记』，中华书局，1993。
 4. 康与之，『昨梦录』，原引自：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大同思想资料』，中华书局，1959。
 5. (美)拉塞尔·雅各比著，姚建斌译，『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6. 李汝珍，『镜花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7. 李德法，「乌托邦思想的产生及其在英国小说中的演变」，福建师范大学，2013。
 7.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商务印书馆，2011。
 8. 卢英宏，「『桃花源记』是一篇小说」，『岳阳大学学报』第10卷第2期，1997。
 9. 施耐庵，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 施耐庵著，金圣叹评，刘一舟校点，『金圣叹批评 水浒传』，齐鲁书社，1991。
 11. 王海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大同思想研究 - 以互文性角度切入」，南京师范大学，2014。
 12. 吴佩林，「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辨略」，『太原教育学院学报』第21卷 第三期，2003。
 13. 辛战军，『老子译注』，『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中华书局，2008。
 14. 宣化法师，『佛说阿弥陀佛经浅释』，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15. 杨天宇，『礼记译注』，『十三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32) (德)约恩·吕森主编，张文涛等译，『思考乌托邦』，上东大学出版社，2010，第187页。

16. 杨秋荣, 「桃花源记-魏晋时期最伟大的玄怪小说」,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第25卷第2期, 2011.
17. 杨柳桥, 『庄子译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8. 袁珂校注, 『山海经校注』, 巴蜀书社, 1993.
19.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 中华书局, 2003.
20. (德) 约恩·吕森主编, 张文涛等译, 『思考乌托邦』, 上东大学出版社, 2010, 第187页.
21. 萧东海, 「论『桃花源记』体裁是小说」, 『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第16卷第1期, 1995.
22. 郑东华, 『先秦大同思想述评』, 『聊城师范学院学报』 第2期, 1995.
23. 周振甫, 『诗经译注』, 『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 中华书局, 2002.

<Abstract>

The Datong Social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Embodiment in Novels

Han, Yu-Xiang

There is such a utopian thought in Chinese culture that dreams of a better world. It is the social thought of Datong.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hinking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e Chinese people use the "Datong Society" thought more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realistic contradic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y try to use this set of theories as a guide for action to overthrow the real society and free the people from the hunger and cold and jointly establish an equal and ideal social system.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hinese have long referred to "Datong society" as the ideal of an ideal country and a better world. This kind of thinking is always reflected in the works of literati, so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Datong social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ese novels and classifies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atong Social Thought with different emphases, in the novel also has three completely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a paradise with a small country and few people, a society that pursues "the highest virtue" and "the best", and a strange and fantasy fairyland blessed land. The three can be regarded as three different literary creation techniques, both true and illusion, relative

reality, and unconstrained. From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atong Social Thought” to the end of literature to novels, it follows an invisible clue from the fantasy of Datong society, to the experience of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lans, and finally to practice. It also contains literati romanticism thought. Although many of the fantasy of the beautiful world in the novel seems difficult to realize from the current perspective, it still does not prevent it from becoming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Chinese Ancient Novels, Narrative literature, Datong Social Thought, Utopia, Ideal world

이 논문은 2020년 10월 9일에 접수되어 2020년 10월 30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20년 11월 9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